

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研究

邓杰,李会敏

(四川文理学院 教务处,四川 达州 635000)

摘要:川陕革命根据地在1932年12月到1935年上半年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这与宣传工作的成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宣传方式因地制宜、丰富多样,宣传内容以根据地建设需求为中心、政治性很强,宣传效果明显、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关键词: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报刊;石刻标语;歌谣戏曲

中图分类号:K29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248(2015)04-0018-06

1932年冬,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转战千里,自陕南进入四川,以川北为中心、在陕西四川两省交界地区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根据地自诞生起就一直面临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发展环境十分恶劣。有来自国民党与四川军阀的军事“围剿”压力,也有山区人民在思想和经济上的贫穷落后。

在艰难的发展环境中,川陕革命根据地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川陕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红军人数由刚入川时的一万四千人发展到八万人左右,根据地扩大到通江、南江、巴中、万源、城口、宣汉、达县、渠县、营山、阆中、广元等24个县市,人口约500万。^[1]而这一系列成就都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密不可分。在学术界,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相较于根据地政权建设、军事斗争、经济建设等方面来说比较薄弱。并且,现有研究比较零散,从中无法窥见宣传工作的原貌。鉴于此,本文概述了学术界有关根据地宣传工作的成果,以期对现有研究有一整体性认识,对加深相关研究有所助益。

一、关于报刊的研究

报刊是重要的宣传方式之一,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党政军各部门高度重视报刊宣传。川陕

省委、省苏、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等各级党政机关都办有机关报,各群众团体也创办有自己的刊物。在整个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共创办了数十种报刊。由于战火频繁,当年的革命报刊已经无法完整地保留下来。由于现存报刊很少,这为相关研究带来了不利影响。

1987年由四川省档案馆编纂、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一书,《选编》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苏区现存报刊的全面整理。全书按党政会议决议、土地革命和肃反、军事斗争的内容分类,收录了1933年2月到1935年3月间,川陕革命根据地各种报刊上所发表的文件42件,评论文章68篇和300多条消息报导。^[2]该书史料翔实,内容丰富,是后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报刊研究的最主要资料来源。

目前,学界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报刊研究多从宏观角度进行论述,属于史实概述性研究。张之华简述了现存的八种报纸,并分析了每种报纸的特色,如“《共产党》报拥有一个突出特色,无论言论或消息,都比较侧重发展、巩固党的组织,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红色报刊受到了高度重视,“党的文件多次明文规定,把《共产党》、《红军》、《苏维埃》等报纸与党的日常政治文件并列,作为地方、部队的党

收稿日期:2015-03-12

作者简介:邓杰(1973—),女,四川达县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团支部必读的学习材料,对于报纸上的重要文字,要详细讨论,并且付诸实行”。^[3]

沈果正《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一文是较早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详细系统介绍的文章,对根据地的主要报刊、报刊主要内容作用及特点进行了论述,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报纸的概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其内容都是宣传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宣传如何贯彻执行党、苏维埃和红军领导机关制定的方针政策、法令及其所作出的决议和指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具有鲜明特点,即内容政治性,标题鼓动性强,文字通俗易懂,版面设置现代化且美观多变。该文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给予很高评价,“在革命战争年代,忠实地执行了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组织给予的光荣任务,宣传了革命主张,传播了革命理想”。^[4]

王明渊和元江具体介绍了《少年先锋报》、《干部必读》。《少年先锋报》是少共川陕省委的机关报,该报重点是宣传党的政策,指导团的工作和青年运动,加强对青年进行形势、任务和文化教育。它在宣传、鼓动、武装川陕革命根据地广大劳动青年群众积极参加土地革命战争和根据地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5]《干部必读》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办,针对对象是军内全体干部,对外具有保密性。该刊内容丰富,属于综合性刊物,具有以下特点:从战略高度探讨问题,对苏区各项重要工作进行宏观指导;撰稿者多为党政军的最高负责人,这是在川陕苏区所有报刊中独一无二的;评论文章所占分量较大,鲜明地提出对时局的认识与解决问题的办法;军事方面的内容所占比重较大;该刊具有严重的“左”倾观点,且相关文章占有较大比例。^[6]

陈雪涛《1919—1949年川东革命老区的红色报刊》对1933—1935年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报刊亦进行了简单介绍。该部分提及川陕省委、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以及西北军区政治部等机关所创办的报刊,并介绍了各报刊的主编,这是其他相关文章较少涉及之处。^[7]以上几篇研究成果属于概述性文章,对川陕苏区时期的报刊进行了简单介绍,没有进行深入探讨,但其可以使我们了解到川陕苏区报刊的简况。

宣传与教育两者具有密切的关系,宣传工作

可以起到教育民众的功效,同样教育工作可以起到宣传的目的。施诗然在《从档案看川陕苏区的宣传教育工作》一文中,以现存档案为研究素材,对川陕苏区宣传教育的整体情况做了一个概述:一是高度重视红军干部和红军战士的教育培训;二是大力进行苏区工农劳苦大众的普及义务教育;三是大力出版报纸杂志,印发学习材料和宣传材料,为苏区宣传教育提供强有力的武器;四是广泛组织军地结合的宣传队伍,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卓有成效的宣传。其宣传教育内容多是政治性的,传播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与红军。各项宣传因组织、措施得力而卓有成效。^[8]

二、关于石刻标语的研究

在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中,对石刻标语的研究最为丰富。相较于当时的报刊资料很少保存至今,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石刻标语虽然也有很大的损毁,但仍有2000条左右的石刻文献标语保留了下来。这些石刻内容包含中国共产党的纲领政策、动员群众积极参军参战、土地问题、反帝反封建民族解放、革命未来的目标、根据地建设等方面的丰富信息。散落在陕南、川北的石刻文物,为相关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资料。

谯长卫认为,镌刻石质革命标语和文献,属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宣传形式。大巴山的红军石刻文献、标语、对联等,多层次多角度反映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历史环境、斗争历程。^[9]张国新《川陕红军石刻: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独特形式和文化景观》认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石刻标语宣传内容丰富,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等方方面面,对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的红军石刻给予了高度评价,且认为当时石刻标语数量庞大,“至于镌刻了多少红军标语,有研究者认为有七八千幅,也有五六千幅之说。据我查阅有关历史文献资料和大量红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回忆录……应该以万为单位来计算”。^[10]

以上两篇文章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石刻标语与文献进行了整体上的史实记叙,而郑丽天《达州红军石刻标语概述》与左汤泉《汉中地区红军石刻标语初识》则分别对达州、汉中地区的石刻标语进行了具体的阐述。

川陕苏区有很多反映民主与民生问题的红军石刻,如“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保护工农利益”、“平分土地”。蔡东洲、黄涓认为,这些石刻文献与标语为川陕苏区劳动者描绘出一幅前景美好的解放蓝图:劳动者建立民主政权、拥有生活保障、享有工作权益,真正体现了劳动者当家作主的地位。两位研究者对其进步性与局限性进行了客观的评价:其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对民主的追求与对民生的重视,这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与进步性;但是,这一时期的政策具有严重的“左”倾倾向,“只强调‘工农专政’、‘保护工农利益’,却错误地将工农以外的一切非生产者都作为专政的对象,忽视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一面……”且其关于解放目标的设定忽视了当地的农村经济环境和所处的战争状态,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同时不利于苏维埃革命秩序的建立和中国革命长远利益的。^[11]

以往对于川陕苏区的研究鲜有提及统战工作,但川陕苏区得以迅速发展,统一战线起的作用至关重要。川陕苏区石刻标语中亦有较多涉及统战工作的,如“白色官兵们:红军官兵都分得有田地,有人代耕,生活待遇一律平等,一切自由,自己为自己干,欢迎你们来参加红军”。统战工作的对象主要是白区官兵以及陕南杨虎城,并且在内容和形式上都颇具特色,便于白军官兵接受。川陕苏区“通过石刻标语等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揭露国民党军阀的反动本质……以分化瓦解敌人,孤立顽固派,争取中间派,欢迎中下级军官和士兵起义投诚”。^[12]川陕苏区的统战工作成效显著,有不少白军士兵受此影响而追随红军。

《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是熊国炳被选为省苏维埃主席后,主持制定的第一个文件。《布告》是川陕省苏维埃重新分配土地的实施办法,其结尾写道:“记着!雇农、佃农、士兵要分得土地;中农的田地不要受人家并吞,不要还粮上税受剥削,自己耕种即归自己所有,就要起来拿起武器,组织政权,来镇压旧的压迫者,土地才转归到被压迫者手中来”。^[13]《布告》为我们展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对象、政策及具体实施办法。该碑亦是川陕革命根据地重要的石刻文献之一。

2010年,巴中市委举办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

语研讨会,林莉著研讨会综述文章。参会学者“充分肯定红军石刻标语是中国乃至世界战争史中的‘文化武器’”,认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石刻达到了三个全国之最: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字符面积最大。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川陕苏区红军石刻具有较高的史料和文物、教育价值,同时,红军石刻的语言风格和大众化效果对当今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有巨大的启示作用。^[14]

三、关于红色歌谣戏曲的研究

川陕革命根据地处于陕西四川两省的交界处,地处山区,经济发展低于全国发展水平。当地教育发展落后,人民的文化素质水平总体十分低下,文盲半文盲占有特别大的比例。据记载,“一九三二年以前,通江、南江两县不仅没有一所中学,就连设备较为完善的小学也为数很少,一般都是私塾,且为地主阶级所把持。因此,识字的人极少,文盲率在90%以上”。^[15]从受众的接受与理解能力考虑,文字宣传有时达不到预期的效果。而歌谣戏曲容易被工农民众所接受,且具有较强的扩散特点,弥补了文字宣传的不足。川陕革命根据地大量红色歌谣戏曲的广泛传播,亦是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特色之一。

沈婷婷在《川陕苏区红色歌谣产生的原因》一文中集中阐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产生的社会背景:当地深厚的民歌传统孕育了红色歌谣,轰轰烈烈的革命实践刺激了红色歌谣的创作,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推动了红色歌谣的兴起。^[16]在该文的基础上,沈婷婷与李敏合作的《川陕苏区红色歌谣初探》一文对川陕苏区红色歌谣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总结,认为:红色歌谣内容丰富,涉及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具有鲜明的特征,即强烈的革命性和广泛的群众性;起到了宣传革命思想与动员革命群众的作用;其是根据地军民情谊的有力左证,红军文化和红军精神的有机载体。这两篇文章对川陕苏区的红色歌谣给予了高度评价,呼吁我们应珍视革命战争年代诞生的这些宝贵精神财富。^[17]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红军以及反围剿革命斗争过程中,出现了许多诸如“劝”、“送”、“别”类型的红色情歌。赖万林《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情歌》从情歌这一新颖角度来反映苏区革命斗争的面

貌。根据地情歌不是单纯地表达青年男女的爱恋,而是以鼓励苏区青年参加红军、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为主要内容,如“不要郎的花花轿,要朗去把革命闹,不要郎的绸缎袄,要郎去操枪和刀,不要郎分手把泪掉,要郎胜利归来哈哈笑”,歌颂根据地青年不屈不挠的斗争意志和勇于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根据地情歌从不同角度反映了苏区革命斗争的面貌。^[18]

川陕苏区时期,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发展出了红色戏曲,以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付严《川陕苏区戏曲(1932—1935)》介绍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工农剧团、省委新剧团、兰衫剧团、省苏工农剧团、总医院新剧团的历史状况与发展演变;并于第二部分以表格形式展现了川陕苏区上演的部分剧目表,如刘湘投江、打土豪、青年妇女歌,有助于对川陕红色戏曲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川陕苏区的红色戏曲配合了根据地建立和巩固的宣传需要,对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发挥了重要作用。^[19]

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目的是寻求工农民众的认同,而支持、参加红军。李巧宁认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军民创作的大量红色歌谣起到了底层动员的作用,红色歌谣在宣传上突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凸显贫富差距,强化广大底层民众对现实的不满;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穷人只有跟着红军闹革命才是唯一出路,才能够解决生存的衣食问题。红色歌谣内容多贴近民众生活、通俗易懂,易为苏区民众所接受。红色歌谣在底层民众中间广为流传,加强了民众对红军的认同与支持。^[20]

四、其他方面的研究

目前,学界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不仅仅限于研究其宣传方式,还对其宣传特点、内容展开研究。毕瑛涛《川陕苏区时期的宣传工作特点》总结川陕苏区时期的宣传工作主要有四大特点:一是主题思想明确,川陕省委高度重视宣传工作的先锋作用;二是紧扣斗争主题,宣传内容围绕根据地巩固和建设的需要;三是宣传形式多样,“十分重视形式的多样化和手法的艺术性,注重宣传方式与效果的最佳结合,使宣传工作在配合中心工作的斗争中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四是注重协调发展,“除了政治斗争的主题之外,川陕苏区的宣传工作还注重社会各个方面的协调发

展,尤其是在社会改造方面和人民的卫生健康方面,宣传工作也做了大量工作……”^[21]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与当时红军采用的有效宣传策略密切相关。唐琼《论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策略》总结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当时历史背景下的主要宣传策略:一是宣传工作得到根据地党政军领导的重视与支持;二是宣传工作内容密切配合根据地在不同阶段的军事、政治斗争需要;三是宣传方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且将农民文化教育与革命宣传紧密结合;四是紧抓对白区和白军的宣传工作。^[22]

川陕苏区宣传方式中有实物留存的革命报刊、石刻标语,其现状并不容乐观:革命报刊损失严重、原始文献寥若星辰,自然毁损、人为破坏直接影响了石刻文物的完好保存。杨尚通就如何收集、开发、保护文物提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思路和方法,并呼吁加强对现存报刊文献、石刻标语的保护与开发,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与意义。^[23]

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成就的取得离不开根据地宣传工作人员的努力与付出,但现有研究对其较少涉及。《刘瑞龙与川陕苏区宣传工作成效简论》是首篇对时任川陕省委宣传部长的刘瑞龙进行的学术研究。“在刘瑞龙的主持下,川陕苏区的宣传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川陕省委宣传部协同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省苏维埃文化教育委员会,将苏区的宣传工作迅速推进”。刘瑞龙在川陕苏区宣传工作方面的建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将宣传工作与苏区当前中心工作相结合,如为配合军事斗争的需要而进行大规模的“扩红”宣传;第二,将宣传工作与苏区特殊地理环境相结合,利用苏区山地多石的特征进行石刻宣传;第三,将宣传工作与苏区民众认知能力相结合,根据苏区民众文化水平低下的情况,宣传内容风格浅显易懂。^[24]另外,《川陕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及主要功绩》亦提及刘瑞龙主持宣传工作的成效,具体表现在: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宣传队伍;组织红军开展扩红宣传工作;组织开展打倒军阀的宣传活动;组织禁种鸦片、加紧春耕的宣传活动;大力开展对白军的宣传工作。^[25]

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中共对白军的分化瓦解与政治攻势亦是当时宣传工作的重要任务。李敏与黄灿认为,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对白军的策

反工作,“扩大兵士运动与组织革命兵变,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党必须利用一切工作机会进行这一工作,对兵士应该有经常带猛烈的煽动性的宣传工作。党必须经过这些工作的切实布置,来组织广泛的革命兵变”。各级党组织通过加强对火线白军的政治宣传、开展对白军俘虏的政治攻势、重视对白军亲属的教育引导、优待白军投诚士兵和白区专门人才等具体工作,分化瓦解敌军,壮大红军队伍,为夺取革命胜利积累了宝贵经验。^[26]

在对川陕苏区宣传工作的研究成果中,以下两篇文章尤其值得关注。

朱晓舟《川陕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宣传试探》首次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扩红”运动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分析。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后,在严峻的内外部环境压力下,开展扩大红军的宣传工作。针对四川军阀的反动宣传,川陕革命根据地制定了构建川民心理认同的宣传策略,通过土地工作提升川陕苏区民众的参军积极性,并在对四川军阀部队的策反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该文跳出这样一个逻辑怪圈,即提及“肃反”就往往联系到“肃反扩大化”,客观论述了“扩红”与“肃反(清洗)”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扩红’运动是川陕苏区在四川军阀的军事压力下开展的‘自救行动’,那么对红军的‘清洗’,则是为确保军队的纯洁性、防止敌对分子混入红军而进行的‘巩固’”。^[27]

余林轩《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述论》是首篇以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为题目的硕士学位论文。该文介绍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宣传内容,总结出宣传工作的三大中心任务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并分析了宣传方式(文字、口头与文艺)与特点(主题明

确、针对性强、文艺性强、参与广泛、内外兼顾)。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虽亦有不足之处,但本文认为“其中宣传工作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广泛开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胜利发展”。^[28]该文在对相关史料使用上也有值得称道之处,大量利用史料汇编及档案材料、资料来源丰富,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宣传工作,较大程度地还原了宣传工作的本来面貌。

五、结语

目前,学术界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对红色报刊、石刻、歌谣戏曲都进行了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其中不乏许多佳作。但肯定其成绩的同时,我们亦应注意到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中还存在着美中不足之处:第一,唐琼曾指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研究,“在研究内容方面,目前采取宏观研究的比较多,整体上把握比较多。微观研究欠缺深入……”^[29]第二,资料引用来源比较单一,多是中国共产党单方面的文件、报刊等资料汇编,对于同时期四川军阀与国民党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相关资料基本没有利用。且对宣传工作成效进行分析时,只是简单地论述工农群众的支持与拥护,而完全忽视了其他阶层的态度。第三,关于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中,还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比如创办红色报刊的种数、石刻规模等。第四,宣传工作中的“宁左勿右”现象并未得到实事求是的认识。这就需要更多学者来关注川陕革命根据地,加强对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的研究,以解决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 [1] 刘长江. 略论群团组织在川陕苏区的活动及贡献[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5(1): 26.
- [2] 四川省档案馆. 川陕苏区报刊资料选编[M]. 成都: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1987: 42.
- [3] 张之华. 排难创新的写照 不胜不休的纪实——介绍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纸[J]. 新闻研究资料, 1981(3): 31.
- [4] 沈果正.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报刊[J]. 新闻资料研究, 1987(4): 62—65.
- [5] 王明渊. 川陕根据地的《少年先锋》报[J]. 四川文物, 1987(3): 71—72.
- [6] 元江. 浅谈川陕苏区《干部必读》[J]. 四川文物, 1989(2): 42—47.
- [7] 陈雪涛. 1919—1949年川东革命老区的红色报刊[J]. 四川文理学院学报, 2011(4): 21—26.
- [8] 施诗然. 从档案看川陕苏区的宣传教育工作[J]. 四川档案, 2011(4): 33—37.
- [9] 谯长卫. 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军石刻概述[J]. 四川档案, 2011(3): 62—65.
- [10] 张国新. 川陕红军石刻: 宣传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独特形式和文化景观[J].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 2011(6): 41—43.

- [11]蔡东洲,黄涓.从川陕苏区红军石刻看劳动者解放蓝图[J].中共党史研究,2010(11):36.
- [12]鄢永都.川陕苏区石刻标语彰显统战威力[J].四川统一战线,2011(9):42.
- [13]苟廷一.熊国炳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布告》碑[J].四川文物,1990(6):21.
- [14]林莉.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标语学术研讨会综述[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71-75.
- [15]牟锦德,朱华.川陕苏区时期的宣传工作[J].宜宾学院学报,2009(11):66.
- [16]沈婷婷.川陕苏区红色歌谣产生的原因[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33.
- [17]沈婷婷,李敏.川陕苏区红色歌谣初探[J].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43.
- [18]赖万林.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情歌[J].文史杂志,2000(3):21.
- [19]付严.川陕苏区戏曲(1932—1935)[J].四川戏剧,2012(6):25.
- [20]李巧宁.从川陕革命根据地红色歌谣看红军的底层动员[J].党史文苑:学术版,2007(3):37.
- [21]毕璞涛.川陕苏区时期的宣传工作特点[J].达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12.
- [22]唐琼.论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策略[J].中国出版,2009(Z3):44.
- [23]杨尚通.川陕苏区报刊文献、石刻标语的作用、现状及保护[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07(6):16.
- [24]李万斌,陈岗,何志明,刘瑞龙与川陕苏区宣传工作成效简论[J].中华文化论坛,2013(6):33.
- [25]刘欣琛,李敏.川陕革命根据地领导人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论述及主要功绩[J].福建党史月刊,2012(14):91.
- [26]李敏,黄灿.川陕革命根据地中共对白军的分化瓦解与政治攻势[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3):103.
- [27]朱晓舟.川陕革命根据地“扩红”运动宣传试探[J].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2):22.
- [28]余林轩.川陕革命根据地宣传工作述论[D].成都:四川师范大学,2014:21.
- [29]唐琼.川陕革命根据地研究述评[J].四川文理学院学报,2012(3):13-17.

[责任编辑 范藻]

Propaganda Work in Sichuan—Shaanxi Revolutionary Base

DENG Jie, LI Huiming

(Dean's Office of Sichu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Dazhou Sichuan 635000,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ive propaganda helped Sichuan- Shaanxi Soviet achieve great in the short over two years from December, 1932 to 1935. The propaganda work varied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the content of which focu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ase and appeared ideological. Subsequently, the work effectively consolidated and developed the base.

Key words: Sichuan- Shaanxi Revolutionary Base; propaganda work; journals; slogan on stone; songs and shows